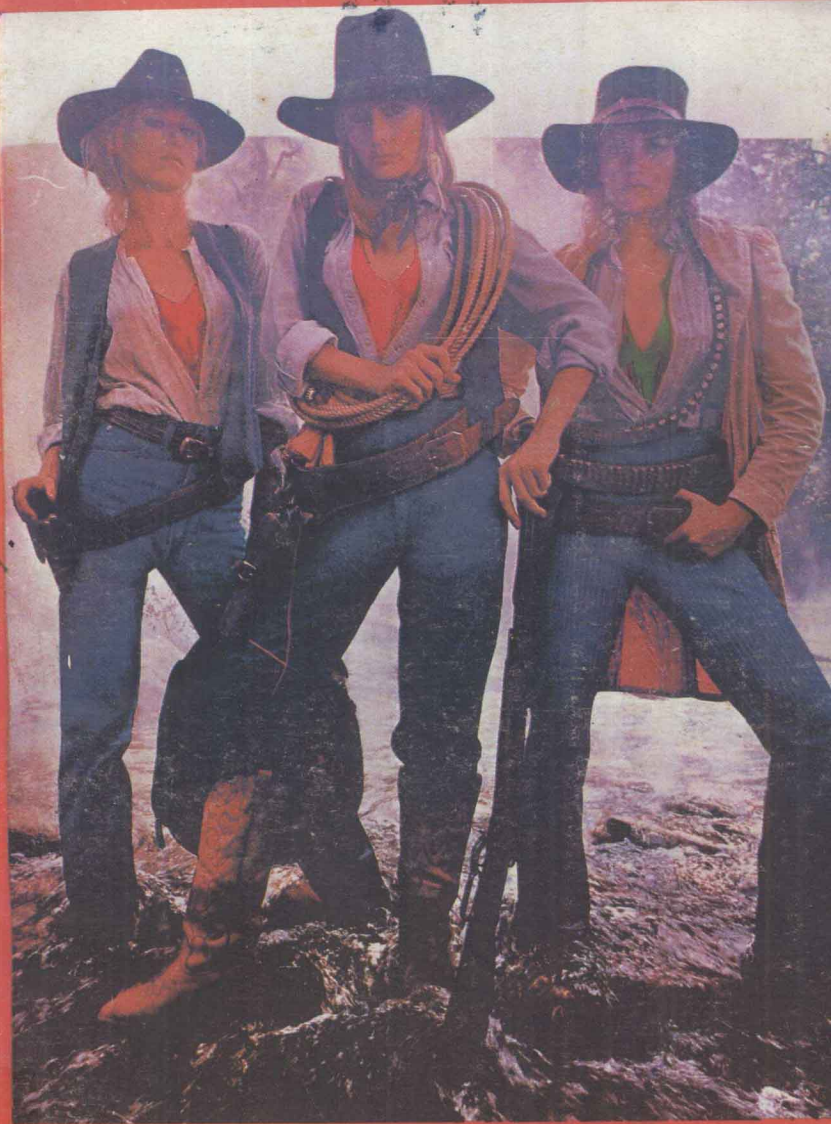


● 劳伦斯 · 桑德斯著 ● 李贵章 王荣生 严忠志 李光荣 译



● 美国全国畅销书

妇女自卫队

(美) 劳伦斯·桑德斯 著

妇女自卫队

李贵章 王荣生 严忠志 李光荣 译



贵州美术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书林

封面设计：张世申

责任校对：李 蓉

妇女自卫队 (美) 劳伦斯·桑德斯 著
The Passion os Molly T.
by Lnwrence Sanders

贵州美术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新华书店发行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4印张 284千字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册

ISBN 7-5413-0035-7/J·258 定价：4.30 元

1987年

3月3日

西弗吉尼亚的坎顿位于查理斯顿西北的俄亥俄河河边，居民一万二千二百四十二人，是个迷人的小镇。以农业为主，附带生产一点轻工业产品，其中有一家为美国军队生产雨披的工厂。

妇女们一面穿戴毛皮外套、帽子、围脖和套靴，一面闲扯着。前天下过大雪，许多街道和人行道上的积雪还没有清除掉。气温还没有怎么上升。

到了教堂外，大多数会员快步朝她们停放汽车的地方走去，同时大声邀请没车的人搭她们的车回家。但有十来个人，包括劳弗林和特纳呆在教堂有灯光的门廊里，讨论有多少人能出席当年全国大会的问题。

当晚寒气凛冽，袭人肌肤，但是没有风。路上结的冰在街灯投下的芥菜色的昏暗灯光中闪着亮。教堂草地上那些黑糊糊的去了梢头的树，仿佛是头戴雪帽的厨师。

就在妇女们笑着，闲聊着的时候，一辆深色的小运货车转过了街区一端的拐角，慢慢朝街这头开来。它在教堂前停

住了。司机一侧的车窗摇了下来，一只空威士忌酒瓶滑过空中在石阶梯上哗啦一声摔得粉碎。

妇女们惊得喘了一口大气，纷纷后退。她们用力朝货车望去。后来，见证人们对车内是一个人，两个人还是三个人各说不一。但车内有个人大声朝门廊里的全国妇联成员骂了几句脏话。

莫莉·特纳挺身而出。

“你才是个烂货！”她尖起嗓子吼道。

话音刚落就响了一枪。她们看到了火光：桔红色的火光；听到子弹打中了教堂门廊上方的石拱顶。诺玛·简·劳弗林穿上毛皮外套的身体一下子在地上倒成了一团。她的毛线帽子卟地一声掉到地上。顿时，其他妇女给吓愣了，战战兢兢地站在那儿。

货车一阵轰鸣加快速度，飞快地在布满很深车辙的雪地上打着滑，上颠下抖地开走了。

莫莉·特纳跪在瘫倒在地上的受害者身边。

“诺玛·简？”她低声说。“宝贝？”

她为对方抚平了黑发。她的手缩回来时全湿了，亮晃晃地闪着光。

被刺的女人是妇女联合会的领袖人物。她叫诺玛·简·劳弗林。被刺之前，她和亲密战友莫莉·特纳，还有其他成员刚开完一个重要的会议，从会议室走出来。在大街上被人暗杀了。

一九八七年，坎顿已经有了一个全国妇联分部，成员共

五十八人。分部主席兼创始人诺玛·简·劳弗林现年三十八岁，在坎顿公共图书馆任首席管理员。还没有结婚，原在肯塔基州勒克辛顿居住，至今她的家人还住在那儿。

劳弗林身体结实，精力旺盛，对全国妇联的事业坚信不移。她是个活跃人物，曾领导过几次女权运动，均获得成功，但这反而危及了她在坎顿镇的饭碗。

比方说，全国妇联打过一些官司，并获得胜诉，结果，妇女们得到了坎顿镇的消防队和警察局的认可。她们派了一些成员把守在一家妓院门口，给去光顾的人拍下一次成相的照片，弄得妓院关了门。她们建立了一所堕胎门诊部，顶住了几次起诉和本地天主教徒们激烈的反对。

但这些胜利却付出了代价。原来人们以姑妄观之的轻蔑态度对待全国妇联坎顿分部，现在大多数公民都公开敌视它了。诺玛·简·劳弗林引以为荣的是，这种公开的蔑视（报纸社论，匿名信，打来的电话，以及在街上听到的不堪入耳的谩骂都表现出这种蔑视）只是导致了四位成员退出组织。

分部计划在一九八七年三月三日晚在坎顿第一唯一神派教堂的地下室召开一次大会。大会事项包括两名新成员的入会仪式以及就开展活动迫使教育局允许女孩子参加坎顿中学篮球队、垒球队和足球队一事进行讨论。

大会由分部执行秘书莫莉·特纳安排并主持。

莫莉现年三十二岁，独身，是农民工匠银行的首席出纳。她出生在坎顿，现在同她妈妈住在“老镇”山巅路上一所宽敞，未经装饰的房子里。她妹妹安恩现年二十八岁，嫁给了坎顿警察局罗德·哈丁警官。

全国妇联坎顿分部一九八三年组建时，诺玛·简·劳弗

林吸收的第一名成员就是莫莉。姑娘敢做敢为，很有主见，对女权运动十分热忱，成为不可多得的第二号人物。

莫莉·特纳和诺玛·简·劳弗林是好朋友，她们关系非常亲密。

大会准时于晚上八点半开始。向大会宣读了上次会议的记录，司库报告了分部当前的财政状况（手头的现金共3479.27美元），莫莉不用讲稿就正在进行的几项活动的进展情况作了十分钟的汇报。

接着举行了两名新成员的入会仪式，会议到此暂时休会，向会员分发了可可和燕麦小甜饼。

会员们重新入座后，莫莉·特纳提出了采取法律手段迫使教育局允许女孩子竞争中学各运动队队员资格的议题。会议随后进行了长时间热烈的辩论。

虽然大家普遍赞成这个建议，但一位成员在发言中表示怀疑，既然足球是一项粗野的碰撞性的运动的并常常造成重伤，是否会有女孩子愿意参加。

这时候，主席诺玛·劳弗林才第一次，也是这个晚上最后一次站起来发表意见。她说，女孩子们想不想踢足球都无关紧要。

“要紧是原则，”她说。“她们必须有选择的权利。”

想发表意见的人都畅所欲言，然后，莫莉对讨论作了总结。她话锋锐利，偶尔还说粗话。她伸出一根指头指着听众说，如果以一些想参加中学运动队而又被拒之门外的女孩子的名义打官司，全国妇联在法律上就更能站住脚。

她敦促会员们去找到这样的女孩子，把她们的名字报上去。

“要证明全国妇联的利益因为教育局的性别政策而遭受了损失，”她说：“也不是他妈的那么容易。我们需要的是这种政策的真正受害者。大家都努力去找一个。”

一九八二年末，在平等权利修正案未获通过之后，有十七名妇女聚集在纽约的美利坚旅馆。她们来自全国各地，年龄在五十六岁和十八岁之间，都是热心的女权主义者。

她们中的每个人都是一个或几个妇女组织的成员，但都对各自组织的战略和策略深感失望。她们觉得，由于决定在现行制度内部开展工作，各女权协会业已受制于政府。

她们还认定，通过增加妇女选民的办法来促进女权运动的目标是没有指望的。至于对受男人主宰的州一级和全国立法机构进行游说——那只不过是把她们的前途当赌注押在她们敌人的慷慨上。

因此，这十七名妇女经过三天争吵不休，有时持续到黎明的辩论，决定组建一个名叫全国妇女联合会的新团体。之所以选定“联合会”，是因为大家一致认为，它的战斗精神比“协会”、“组织”、“会社”或“团联”都强。

她们起草并签署了一份列举全国妇女联合会奋斗目标的“解放宣言”。其中有下列各项：

——同工同酬。

——联邦资助的日托中心。

——男女同样应征入伍。

——规定家庭主妇的最低工资。

——制定一条法律规定各地、各州和联邦政府的任命性职务可由妇女担任。

——确保女性同性恋者的合法权利。

——由联邦资助领福利救济金的妇女们的堕胎。

——离婚妇女有权分享其丈夫的养老金、退休金和社会保险福利。

还有几项有争议的目标。

这些目标的许多项或者全部虽已包括在现存女权组织的纲领里，但全国妇女联合会打算用以实现它们的方法却更为强硬。她们承认自己是极端份子，打算使用革命的那套方法。

比方说，她们并不公开放弃使用抵制、群众示威、设纠察线、破坏、恐怖行动和对肉体施加暴力等手段。虽然在美利坚旅馆召开的会上没有把暗杀作为推进她们事业的一种手段公开加以讨论，但出席那次会议的几位妇女现已证实，暴力手段得到了默认。

在创建后的头四年里，全国妇女联合会主要致力于筹集资金，以便在华盛顿特区建立全国总部并在所有五十个州中建立分部。各州分部接着又在大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县城建立了支部。

在组织壮大的初期，全国妇联机关刊物《呼唤》诞生了，每年都要举行州大会和全国大会。会员人数稳步而缓慢地增长。之所以增长得缓慢，是因为全国妇联的领导们在强大到可以发动一次咄咄逼人的全国性运动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之前有意保持低姿态。

不过，在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六年期间，州和各地的基层组织受到鼓励，为战斗训练，为取得全国妇联将发动的大胆行动的经验，开展各自的运动。（“战斗训练”是经常见诸

全国妇联的指示文件和《呼唤》中一个典型军事用语。)

在组织成长的岁月里，担当主席的是劳拉·坦普尔顿太太，她是一个寡妇，富于革命热情，来自旧金山。一九八二年时，她已四十八岁，在把全部身心献给全国妇联之前，她从已故丈夫那儿接过一家卡车租赁公司，经营得十分出色。

迄至一九八六年底，全国妇女联合会已拥有近十萬会员，成为了一个具有几个州、市、县分部的全国性组织，现金储备也比较雄厚。

坦普尔顿和她的工作班子断定，着手她们的激进计划的时机业已成熟。计划了一些全国性的富于斗争精神的战役，准备提交给预定于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在芝加哥召开的全国大会。

但诺玛·简·劳弗林于一九八七年三月三日在西弗吉尼亚的坎顿被人谋杀了。

3月5日

全国妇女联合会总部所在的办公大楼在华盛顿特区的H街西北路，它色彩单调，外形粗俗。全国妇联占了整个第五层。主管人员的办公室都异常简朴（家俱都是二手货），大部份地方都给了《呼唤》周刊的编辑人员或者被复印机、会员档案柜和姓名地址印写机占去。

劳拉·坦普尔顿主席在拐角处有一间办公室，不过窗外的景色并不迷人。室内的家俱是一张碰损了的办公桌，一张吱吱响的转椅，一个木头档案柜，两张跛足扶手椅，一张接

待来访者用的皮面长沙发。还有一盆半死不活的喜林等。

坦普尔顿个子小巧，脾气急燥，喜欢穿绣花高领的印花布连衣裙。脆弱的身体掩盖了她的勇武精神和近于执拗的决心。她是天才的演说家，个子虽小，声音却震得人耳鼓嗡嗡响。

上午十一点，她会见了全国妇联常务副主席康士坦斯·安德伍德。安德伍德一边翻阅一大叠剪报、电报、电传记录，一边向主席介绍了有关诺玛·简·劳弗林遇害的最新情况。

“就是这样，”她啪地一声关上文件夹，声音平淡地说。

“死于一颗弹射到她头上的步枪子弹，开枪者尚未查清。我认为，我们应该拍份电报去坎顿分部，表示悼念并提供财政上或其他力所能及的帮助。”

坦普尔顿想了一会儿。“对，”她说，“去办吧。那位女人叫什么来着？”

“诺玛·简·劳弗林。”

“哦，对。把电报抄件一份给西弗吉尼亚总部。应该随时让她们了解我们的工作。打听一下葬礼什么时候举行，然后送些花去。让所有分部都知道，这样她们也可以送花去。”

“好的。”

一时，两位女人都没有说话，只是呆呆地望着墙。

“康妮，”劳拉·坦普尔顿终于先开口了，“这是一桩莫名其妙的，毫无意义的人命案，很可能是一个喝醉的乡巴佬瞎闹，巴不得有个机会扳动一支新猎枪的扳机——你要知道，他只想试一试枪。”

“很有可能。”安德伍德说。

“这件事有详细报道吧？”

“是的，大量的报道。登在纽约和华盛顿各家报纸上。《今日要闻》也在报道，我今天早上所说，《20/20》也可能刊载一部份。”

“啊——哈，”坦普尔顿说，“昨晚上，我老在考虑这件事，一夜都没合眼。有个办法可以让这位姐妹不致白白地死去。假定我们立刻掀起全国性运动，你觉得如何？我们现在有了公众的同情，因此我们行动会被看作是对野蛮谋杀的正当回击。”

康士坦斯迟疑了一下。“对，”她说：“这件事可以干。”

“事多，”主席告诫说，“而时间却很紧。”

“我们能办成，”安德伍德保证说。“大家都憋着一口气。”

“好的，咱们说干就干。我认为，第一步是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我先发表一篇表示愤怒的声明，然后再答记者问。我写声明，你去安排记者招待会。”

“我马上去办。”安德伍德保证说。

她转过身，径直朝通向过道的那个开着的门走去。

“康妮，”劳拉·坦普尔顿在背面喊了一声，“那位姐妹叫什么来着？”

安德伍德转过身来，脸上露出勉强的笑容。“诺玛·简·劳弗林，”她说：“劳拉，你是第二次问我了。”

主席盯着她好一会儿。“把门关上，”她说：“回来给我坐下。”

副主席照吩咐做了，她在办公桌边一张不成形状的扶手椅上坐下。

“我的记性真差，”坦普尔顿气冲冲地说。“我一直用大量

记笔记的办法把它遮掩起来。你以前没注意到，对不？”

“从来没注意到，”安德伍德撒谎说：“劳拉，人嘛，偶尔都会忘事的。我有时候也——”

“不，这不只是一时疏忽。毛病一年前就开始了，现在愈来愈糟。昨天我就老想不起办公室的电话号码。不要多久，我还会连你的名字也忘了。接着是我自己的名字。”

“不可能——”

“是真的，”小个子女人厌恶地做了个苦脸说，“情况就是这么糟。一个月以前我去找过我的大夫，找过一个神经病学家，一位专家，还找过另一位专家。你以前难道就不觉得奇怪我为什么常常不在办公室？”

“劳拉，我以为你有事要办。”

“只不过是私事。再征求意见已经没什么用了。医生们都认为我得的是阿尔采麦尔氏症。”

“啊，我的天。”

“没有查出病因，”坦普尔顿自顾地往下说：“也没有治疗方法。病情逐渐恶化，直至死亡。不过他们对我说，不出意外的话，在变成呆痴之前我还可以正常工作。一年或者两年。”

安德伍德没有出声。

“一两年之内我可以干许多工作。我们就马上着手我们的计划吧。我向上帝发誓，一定要干成！”

“我们准会干成的。劳拉，你能肯定……？”

“我非常肯定。我知道我的病情。但我一定要只争朝夕，尽快将这个运动搞起来。你可以帮我一个大忙。”

“你要我干什么都行。你是知道的，什么都行。”

“我以后还要依靠你。最要紧的是，这个情况只能你知我知，对任何人都要封口，就连与你同床共枕的那个傻蛋也不能知道。你答应吗？”

“我答应你。”

“我要你在我旁边多瞧着点，康妮。在我忘事的时候就提醒我一下。在我办事不当的时候就给我指出来。我的声明在你检查后才能发表。遇到我无法应付的情况，你得给我挡着。我真心诚意希望，在我实在拖不下去的时候，我还有自动下台的那点头脑。但是如果我病得连这点自知之明都没有的话，我要你召开一次常委会把我踢出去。你愿意帮我这个忙吗？”

“我愿意。”康士坦斯·安德伍德冷漠地说。

3月6日

在西弗吉尼亚的坎顿，有几个男人支持全国妇联和它的事业——不过谁也没胆量公开亮出他们的观点。但他们匿名提供现金捐款，并在需要时私下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建议。

其中之一就是坎顿警察局的罗德·哈丁警官。他娶了莫莉·特纳的妹妹安恩。莫莉和她妈妈约瑟芬·特纳太太住在山巅路上的家里，罗德是那儿的常客。

三月六日晚上三位特纳家的女人在一起吃晚饭，她们吃完后，不当班的罗德·哈丁才到。不过她们把吃的热着等他：一盘热肉，豆子、泡菜、甜奶油粗面包、两罐德国啤

酒。女人们围坐在厨房木饭桌边喝咖啡，听哈丁边吃边谈。

“他们明天中午发回尸体，”他对莫莉说：“你们作了安排没有？”

“给哈钦逊殡仪馆谈妥了，”她说：“由他们给尸体防腐。我们今天选好了一口棺材。我们在这儿举行一个小仪式，然后殡仪馆开车把棺材送到勒克辛顿。她家里在那边有一小块地。安恩、我和其他一些女人要去参加葬礼。”

“这一切费用由谁来开销？”

“全国妇联，”莫莉说。“我们收到了全国总部的电报。”

“太好了！”特纳太太说。

“罗德，”安恩说，“你能不能脱身同我们一起去勒克辛顿？”

他推开吃空了的托盘，点上一支烟，啪地一声打开了第二罐啤酒。

“亲爱的，很抱歉我去不了，”他说：“我还在调查这件事，请一天假都不行。”

她们知道这不过是推辞而已，但能够理解他。公开表示同情他会吃不消的。

哈丁是个彪形大汉，粗犷豪爽，长着一头浓密的沙色头发。他的上唇稍长，留着一蓬下垂的金色胡子。一双黑色的小眼睛，每当他思考或考虑回答问题时，他的眼睛就往外突。

“是一颗步枪子弹，”他对她们说。“至少我们已经快确定这一点了。口径是三十毫米。但它从石头上弹射开的时候变了形。我们打算把它送联邦调查局以便弄确实，但是我差不多已经能断定，发射子弹的就是一支三十毫米口径的步枪。”

“真了不起，”莫莉尖酸刻薄地说：“这么一来，范围就可以缩小到坎顿县的一百万支三十毫米口径的步枪了。”

“是这么回事，”哈丁承认了：“关于深色小运货车的调查也是这个情况，莫莉，你还记得当时是什么对我们有帮助吗？”

她摇了摇头。“我告诉过你，罗德，天色很黑，事情来得很突然，谁也来不及真正看见什么。有人在货车上骂我们，我回骂了他，接着就是乒的一声。”

“如果再听到那个声音你能听出它吗？”

“很可能听不出。当时只听到一个男人在吼叫。”

他叹了口气。“算了，我们还不打算撒手不管。你知道，第一个赶到现场的是埃迪·哈洛威，在叫了救护车之后，他把能找到的那个瓶子的碎片全收集起来。我们把它们送到了查理斯顿，想看看化验室的人能不能提取一些指纹。”

“那会有什么帮助？”安恩问。

“哦，如果我们能找到本地某个犯过法的人的指纹同它们相同就会有帮助。那些指纹我们是存了档的。我承认，这个尝试成功的希望不大，不过这也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大家都沉默下来。特纳太太站起来，用小跑的步子围着饭桌转，开始收拾桌上的东西。

特纳太太已经五十八岁了，还象一只喳喳叫的小鸟，面色红润，眼睛老是吃惊似地大睁着。在安恩出世不久，她就被丈夫遗弃了，靠着在拉什街超级市场里当会计和在宽敞的家里出租房间，供两个女儿读完了大学。

“罗德，”安恩说：“如果要你猜是谁干的那件事，你会猜哪一个？”

“哦，亲爱的，”他把一支手搭在她肩膀上说，“那我可猜不着。城里下得了手的下三烂有十来个。我指的是那些杀了人，晚上仍然倒床就呼呼大睡的真正社会渣滓。”

“我来猜一下，”莫莉尖锐地说：“我猜莱姆逊两弟兄。他们是镇上的两头大猪。”

罗德·哈丁警官望着她，没有说话。他们让碗碟堆在洗碗池里，一齐走进了大得象岩洞的起居室。他们紧紧坐成一圈，坐了一个小时。女人们低声谈论已计划好的宗教仪式，棺材和葬礼，哈丁则满满装了一斗烟抽起来。

特纳太太自告奋勇要为死者收拾衣物，以便莫莉和安恩把它们全带回莱克星顿。安恩说，她们应该把她们的妇联组织重新命名为诺玛·简·劳弗林分部。莫莉说那是个好主意，答应在预定选新主席的特别会议上把它提出来研究。

哈丁夫妇在十点半左右离开了，莫莉和她母亲随后打扫了厨房。特纳太太吻了女儿，说她要就寝了。虽然母女俩靠莫莉的工资和几笔投资所得生活也过得去，但她仍然在超级市场工作。

“别呆得太晚，亲爱的，”她敏捷地跨上铺地毯的楼梯时嘱咐说。

莫莉去到厨房检查后门是否上了门，拴上了铁链。她检查了通向环形门廊的侧门，又检查了前门，前门整夜都有一个户外灯泡照着。

莫莉在起居室留下一盏灯不关，然后走进一个曾经是她父亲私室的方形房间。她现在把它用作处理全国妇联事务的办公室。屋里家俱不多，全是家里其他房间不用的东西：拉盖书桌，有罩的灯，一个摆着一台老式雷明顿打字机的木头